库伦旗乌兰牧骑下乡演出，观众看得高兴，演员演得开心。
（均受访者供图）

草原上传来乌兰牧骑的歌声

本报记者 **付鑫鑫**

1957 年，一支充满希望、怀揣梦想的队伍在内蒙古悄然萌生。他们没有炫彩的布景，就用蓝天作剧幕；他们没有华丽的场地，就以草原为舞台；他们走到哪里就为哪里的农牧民服务，用歌曲和舞蹈把党的声音传递到每一个农牧民身边……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乌兰牧骑，蒙语意为“红色嫩芽”或“红色轻骑”。

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里，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骑不忘初心，怀着对草原、对大漠、对人民、对艺术的无限热爱，始终坚持扎根基层，将快乐的种子播撒在 118 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大地上，留下一阵阵欢歌笑语、开了一路的幸福之花、结出一串串丰硕的果实。

已经在草原上活跃了 60 年的乌兰牧骑，目前共有 75 支，各族演职人员近 3000 人。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的日子，记者由东向西，择取通辽市库伦旗、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以及中国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之一——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等 4 支乌兰牧骑队长、演员的故事以飨读者，希冀从中管窥乌兰牧骑曾经辉煌的历史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

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里有三家两代演员，左起儿子云哲和队长白长利，儿子郭金鑫和母亲苏宝格，女儿其其格（后排）和母亲斯仁、女婿胡德尔。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下乡演出，演员们在后台拍照留念。

额济纳旗乌兰牧骑春季下乡演出，经常深入沙漠腹地，有时会遇上沙尘暴。

新生一代：钱多钱少舒心就好

“姐，你等我一会儿，到我们节目了。”来自通辽市库伦旗的舞蹈演员单良一边说，一边奔向舞台侧后方准备上场。

说是舞台，其实再简易不过。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苏木（“苏木”为蒙语，相当于乡、镇）阿力木图嘎查（“嘎查”为蒙语，相当于村）委员会门口空地铺上一方红毯、配上一台音响就成。

据介绍，阿力木图嘎查分上下两组，共 100 多户牧民，约 400 多人。“这次乌兰牧骑艺术节惠民演出，前前后后来看的应该有 300 多人吧！”开车的沈师傅一皮卡就拉来老老少少 10 个人，“开辆大巴，估计也能装满了载来。”

当天，在家听广播说有乌兰牧骑来，明根白音和老伴斯琴其木格不到下午 2 点就早早来嘎查委员会等着了。家里 100 多头羊拴在羊圈里，他打算看完节目再回去放羊。

“歌唱得好听，舞跳得好看。以前在大板镇看过，这次比以前的还要好看，不一样。”又黑又瘦的明根白音乐呵地笑着。

现场，赵文立一直举着自拍杆，认真地用手机录像。他说，父母都七十多岁了，从来没有看过乌兰牧骑表演。“这次录下来，带回家给二老好好看看。虽然听不懂蒙语，但图个热闹嘛！”

下午 4 时许，单良参演的男子群舞节目《生命的律动》，以强劲有力的动作彰显蒙古族男子的英雄气概，赢得满堂喝彩。

单良 2008 年从科尔沁职业艺术学院舞蹈专业毕业，考入乌兰牧骑。“每次下乡演出，能把所学的专业带到家乡，学以致用，为草原牧区送上歌舞曲乐。看见农牧民们那期盼的眼神和喜悦的表情，我们自己也觉得特有成就感，因为我们可以为他们带去更多欢笑。”

有一次表演完，夜已经很深了，一对老夫妻拄着拐杖在表演场地看大家打包行李。“后来，车子都开出去了，老先生和老太太还站在原地，冲我们挥手再见，目送我们离开。那时，真的特别不舍，但我们又不可能不走，毕竟乌兰牧骑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嘎查演出，第二天还有下一个嘎查等着我们呢！”单良说这话时，语速变慢了，眼眶中亮晶晶的。

不下乡的日子，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就在单位排练。不同于坐班，队员们上午各自练基本功，下午在练功房集训。有时为了赶戏下乡，夜里加班，彩排到一两点是家常便饭。

“赶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排练。”单良说，即便这样夜以继日地连轴转，转了 9 年，他一点也不“心累”，因为他真心喜欢乌兰牧骑，并引以为傲。

除了舞蹈，单良还喜欢摄影和旅游。在现场，很多演出剧照就是他用单反相机拍的。平日里，每到一处新鲜的地方，忙里偷闲，他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展览馆溜达溜达，看看另一方的水土和文化。

“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幸福，没必要去羡慕别的艺人、明星挣大钱，知足常乐嘛。在乌兰牧骑月薪 3000 多元，不用争名夺利，打交道最多的是老实巴交的农牧民，还可以经常去外地。上次，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演出，台下的掌声此起彼伏，台上的演员铆足了劲，演出相当成功。”单良说，这回来赤峰市巴林右旗参加第七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也很有意思。“我们来幸福之路苏木的路上，车子翻过一片沙地，爬上坡顶往下看，就见一条平整的柏油马路蜿蜒曲折地通向阿力木图嘎查，周围都是开阔的草原，真有一种踏上‘幸福之路’的感觉。”

与单良的心细如发不同，今年 25 岁的马继贤算得上“心够大的”姑娘。从呼伦贝尔盟民族艺术学校毕业后，她先是在海拉尔歌舞团工作。3 年前，冲着鄂温克族自治旗是中国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之一的响亮名号，她跳槽了，“我是鄂伦春族，但我喜欢鄂温克族的文化。刚才，我们第一个节目《魅力彩虹》表演的‘瘸子步’，好玩吧？这是鄂温克族的民族特色。”

这天，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在巴林右旗政府广场举行惠民演出。傍晚七八点，盛夏的夜幕降临，舞台东南西三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舞台后方西北角，有个简易的蒙古包，那是女演员们换衣服的地方，而男演员们只能光着膀子坐在一堆行李箱中间的塑料板凳上候场，轮上节目时就抽出行李箱里的戏服，直接套上、登台表演。

“姐，你能帮我拿一下镜子吗？”演完第一个节目之后，马继贤只用了一两分钟就从蒙古包里换装出来，再下一个节目是女子群舞《瑟宾吉勒仁》。这次惠民演出，一共有 4 个舞蹈，她都要参加。“蒙古包里没有灯，大家都是拿手机电筒换衣服。这个头饰用发卡固定住一会儿就好，马上又要换行头了。”

频繁奔波于舞台和后台，马继贤动作利索，快人快语。“舞蹈的艺术生涯很短，但如果在乌兰牧骑，我可以一直跳下去。在这工作，感觉很舒心。明星钱多，不一定有我自在。对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艺术节，相信以后还有更多机会学习呢！”说完，她又匆匆登台表演去了。

中坚力量：千金难买我喜欢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队长白长利的眼中，马继贤挺让人省心。让他忧心的是队里有 26 个合同工，与在编的 32 人同工不同酬。“小伙子们都单身，每月领着 1760 元的最低工资，吃几顿饭就没了，还租着房。有个大龄青年 34 岁了，至今没成家……指不定哪天就有人不干了，愁人！”

白长利年龄不足半百，眉毛总是皱着，黝黑的脸上透着无尽的沧桑。1986 年，他加入乌兰牧骑工作。那个年代下乡演出，交通不便，内蒙古地广人稀，一走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二三十号人，用勒勒车拉上服装、道具，以及演员的被子、干粮就出发了。没有住宿的酒店，夜里演出结束，由每户牧民领着一两个演员带回蒙古包睡一晚；没有吃饭的地方，要么受邀上牧民家里做客，要么就着干粮喝点奶茶。

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结束后，很多牧民还不愿意走，想学交谊舞。“我们就在表演以后教他们跳，跳着跳着就到了凌晨三四点，牧民们该去挤奶干活了。”白长利回忆往事，不由地笑了。那次，直至人群散尽，东方出现鱼肚白，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才各自补眠。

2000 年以后，电视机、手机越来越普及。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新变化，白长利也一直在创新节目内容。现在，3 年一届的乌兰牧骑艺术节，一次会演要准备 13–14 个节目，都得创新。“服装要换、音乐要新，还要请外面的导演来编戏，少则两三万，多则三五万，都得花钱。”

白长利算了一笔账，每年 6 月到 9 月下乡演出，一天演三场，上午场 10 点到 12 点，下午场 3 点到 5 点，夜场 7 点到零点。乌兰牧骑下乡演出 100 场，国家补贴 20 万，相当于一场 2000 元。一场演出实际所需演员至少 30 人，16 个舞者（8 男 8 女）、七八个器乐、七八个声乐。如今，用大巴车装行李载人，加油费、过路费，还有三四十个人的吃饭住宿，2000 元补贴所剩不多。

“乌兰牧骑是公益性全额文化事业单位，不能搞商演。队伍短小精悍、队员一专多能、装备轻便灵活、节目小型多样一直是乌兰牧骑的特色。所以，现在，我们正努力培养自己的导演，自编自导自演，就不用花钱请外人了。”白长利说，1985 年出台的第二版《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工作条例》和 2010 年自治区两办转发的《关于加强新时期乌兰牧骑工作的意见》时隔久远，如有新版条例出台，希望能在人员编制和商演上给出弹性空间，“有人又有钱，才能干大事”。

三十多年寒来暑往，白长利有过大好的机会跳出乌兰牧骑，去电影公司干管理或者上文化馆当干部，但他拒绝了。“有句话叫，千金难买我喜欢。”白长利坦诚地说，“可能你们年轻人没法理解，但我们这代人是真爱乌兰牧骑，没别的。将来老了，回首过去，不会后悔。”

比白长利大两岁的傲根，是单良的上司、库伦旗乌兰牧骑队长，蓄着一头长发，很有艺术家的气质。因为标准的蒙古人长相，他还演过成吉思汗，“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不过，傲根在乌兰牧骑干的不是明星的活，而是管理。他以前在哲里木盟艺术学校学习声乐，后来又在内蒙古大学读了在职本科。

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乌兰牧骑事业处于低谷。面对只能发 50% 工资的乌兰牧骑，傲根决定停薪留职，到南方打拼。1993 年到 1998 年，傲根和几个小伙伴们组了个小团，进过北京城、闯过上海滩，用行里的话说，天天“跑场”。广州、深圳的大饭店里，三五十桌的观众，有的老板送一支花夹着 500 块现钞点歌。就是嗓子破了，他们也得继续唱。

在南方的日子，傲根挣到了钱，但觉得自卑，人生没有意义。白天演出，晚上输液，因为要给那些来吃饭的大老板敬酒，白酒、红酒、啤酒混着来。没有人关心一个“卖唱的”健康，而他真的喝出了胰腺炎。

以当时的房价，在南方安家落户，傲根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可是，身为长子、从小就很孝顺的傲根发现，父母并不适应南方的生活，家中还有娇妻幼儿。更重要的是，他舍不下乌兰牧骑这份事业，“我 17 岁就开始搞声乐，不能半途而废！”

其实，乌兰牧骑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像库伦旗是中国安代艺术之乡。安代，最早是用来医病消灾的宗教性舞蹈，后来发展成为一门集歌舞、曲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被誉为“蒙古族第一舞”、蒙古族舞蹈的“活化石”。近几年，库伦旗乌兰牧骑编创演出的《天地安代》《激情安代》《火红安代》《欢乐安代》都是以安代为主线，就连今年参加艺术节的会演也是《绿色库伦火红安代》。

2002 年当上队长，傲根先是整顿“老弱残兵”，然后从牧民家庭、艺校毕业生中招兵买马，补充新鲜血液。15 年过去了，如今的他仍觉得自己像只老母鸡，背后跟着一帮小鸡仔。这次带队参加艺术节，他并没有住在主办方安排的大板镇蒙古族中学宿舍，却坚持每天深夜到宿舍点名，“搞文艺的自主意识强，一不留神就找不着人了……”

库伦旗乌兰牧骑队员平均年龄 26 岁，在编 42 人。傲根说，他不担心人员流动，只希望新版条例能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出得去、进得来”的问题，“有些年纪大的人没有好地方去，会影响现有队员的干劲；现在招新人，单凭文化分数论高低，不按艺术才能论成败；长此以往，人才梯队会断层，青黄不接。”

未来，他还打算创作排演新版《安代传奇》，“在我退休前，能把这事做好就算功成身退，可以颐养天年了”。

老有所为：此情可待成追忆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成立于 1957 年 6 月 17 日，是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今年 52 岁的塞西雅拉图是乌兰牧骑的老队员。他 15 岁考入内蒙古艺术学校（现为内蒙古艺术学院），5 年后毕业分配到乌兰察布市民族歌舞团演奏笛子，并自学了 2 年的萨克斯和弹琴。

后来，苏尼特右旗大旱，牛羊牲畜都死光了。家中尚有病重的母亲和残疾的哥哥，塞西不得不回家乡休养生息了三四年。90 年代，塞西在乌兰牧骑工作，薪酬微薄。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他带着拿手的乐器去“跑场”，一趟有 100 元的演出费，一个月能演三四场，“哪有天天结婚的不是？商演不可能一直都有，还是乌兰牧骑稳定。苏尼特右旗是第一支乌兰牧骑，历史悠久，高端大气上档次。”

2007 年，乌兰牧骑事业受到重视，组织架构变了，人也多了。科班出身的塞西，凭借自己扎实的内功和坚持不懈的勤学苦练，逐渐从乐器演奏向乐队指挥转型。马头琴、呼麦、火不思、笛子、扬琴、古筝、打击乐、三弦……在他耳朵里“丝丝分明，一个音节也跑不掉”。这次，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参加艺术节会演，开场《心中的歌》就是塞西自编、指挥的节目。

这么多年，塞西和他所在的乌兰牧骑队员一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到过东南亚，去过欧洲、美洲。“我已经没什么好遗憾的，等到 60 岁退休就可以回家抱孙子啦”。说完，他坐在学生宿舍的下铺哈哈大笑起来。

又一个晚上的惠民演出结束，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乌兰牧骑在队长雷东香的带领下，拖着疲惫的身躯、大大的行李箱赶往大板镇蒙古族中学足球馆彩排。

由足球馆临时改建的舞台上，演员们刚开始走位就发现不对劲，“雷队，这个舞台太深了，走不过去。”

雷东香站在舞台对面的至高处——音响控制台，接过话筒大声吼道：“那就散开来一些，大家都往外多走几步。”

这是额济纳旗乌兰牧骑第一次参加艺术节会演，雷东香很紧张。为了让音响师、灯光师在晚上 10 点到零点还能配合彩排，她早早准备了一个双肩包，包里装着矿泉水和红牛，一进场就递给他们。

1980 年，雷东香高中毕业。那时，家里经济特别贫困，她去饭店给人家端盘子，一个月能挣 40 元补贴家用。每次从饭店回家，路过乌兰牧骑的练功房，她常常趴在窗子上偷看。

第二年赶上乌兰牧骑招生，雷东香攒了 3 个月的零花钱，又问别人借了 0.5 元，凑足 2 元钱报名费，瞒着家人偷偷报了名。许是曾经在体操队练过软功，她一击即中，考上了乌兰牧骑。但是，父亲却以“乌兰牧骑是大染缸”为由，不让她去乌兰牧骑工作，还说“干干净净的闺女不能到乌兰牧骑学坏了”。

当时的乌兰牧骑队长、指导员到家里做了 3 天工作，只有母亲一个人答应，并悄悄带她去办手续。自此，雷东香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舞蹈演员。

1984 年的一天下午，额济纳旗乌兰牧骑乐队有个演员生病，雷东香临危受命，被音乐老师叫出来连夜学习弹吉他。刚开始练吉他，她满手血泡，却一刻也不能停，因为要赶第二天的演出。她一边哭，一边练。就这样练了半天一夜，第二日，雷东香涂着红药水、紫药水上场了，抱着“人在弦在”的决心完美过关。

有了第一次的高效救场，雷东香在音乐的道路上开启了“打怪升级”模式，随后 3 年，她学会了电贝司、电吉他和架子鼓。

1995 年，前往酒泉看病的雷东香，被酒泉市歌舞团团长一眼相中其编舞才能。5 天后，一纸商调函飞到额济纳旗。对于雷东香，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因为 32 岁的她几乎跳不动了。而当时，受经济大潮影响，乌兰牧骑队员所剩寥寥，工资有限。几经周折，她离开了乌兰牧骑，一走就是 17 年。

2012 年，额济纳旗乌兰牧骑为了充实队伍，并解决雷东香与其丈夫两地分居的问题，将她调回乌兰牧骑。回到家乡，雷东香深感，现在的孩子不像她们那代人有冲劲，“以前，我们会为一个小小的演出机会抢破头。哪怕错失了一个节目，暗里也会跟自己较劲，下次非上台不可。哪像现在的孩子，没有节目，求之不得，乐得逍遥。所以，我常开玩笑，你要恨谁，就让他（她）当乌兰牧骑队长。”

在变的不只是乌兰牧骑队员，还有他们的任务。60 年代，扫盲、理发、修理收音机；70 年代，学唱样板戏、革命歌曲；80 年代，宣传科学放牧、科学种植，帮牧民剪羊毛驼毛；90 年代，扎网围栏、扎羊圈；2000 年以后，种树、种草，绿化草原，挖掘整理当地非遗项目；2010 年开始，挖掘整理非遗的同时，还将非遗创作成舞台艺术进行推广。

地处内蒙古最西端的额济纳旗，每年春天是乌兰牧骑下乡演出的最好时节，因为那会，农牧民都在家中春耕、剪羊毛。不过，深入沙漠腹地温图高勒苏木、古日乃苏木，队员们会在途中遭遇沙尘暴。这时，雷东香就会率领队员们跳下车来，用篷布盖好乐器行装，用身体压住四周。直至沙尘暴过去，队员们抖落浑身沙土、继续前行。

“我把自己最美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乌兰牧骑，现在，我又回来了。我们的根在草原，农牧民需要乌兰牧骑，乌兰牧骑更需要农牧民。”临近子夜，雷东香还在音响台指挥着她的“孩子们”。她说：“要是下乡，我们根本不用彩排走位，轻车熟路，手到擒来。”

如今，白长利 24 岁的儿子云哲，也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工作。“他喜欢舞蹈，也喜欢乌兰牧骑，这是他的选择。将来，孙子要不要继续下去不好说，拭目以待吧。”他意味深长地说。